

1608

安陽縣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安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

# 安陽縣文史資料

第四輯

(內部發行)

贈 閱
請 交 換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河南省安陽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EC76/31

主 编：周万民

协 编：马多怀

安阳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安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浚县印刷厂印刷

## 前 言

《安阳县文史资料》第四辑，是县政协一九九三年换届后，在政协安阳县第七届委员会领导和关注下出版的。在本书征稿、编纂和出版期间，中共安阳县委、安阳县政府在各方面给了大力支持，及时解决了各种问题，充分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和政协领导同志对文史资料工作的关怀和重视。

本辑文史资料出版之际，正值全国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时，所以首题选用了《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一文，作为对毛泽东同志的纪念和缅怀。其它35篇资料，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抗战前后和解放战争期间安阳人民如火如荼的斗争及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善恶功过。对于安阳县的人文、自然景观，风俗民情，也以适当篇幅进行了记述。尽力使政治性与科学性相一致，集史料性与趣味性为一体，展示文史资料的特点和作用。

本书是在全县各界人士和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下出版的，在这里对他们一概表示感谢。由于编辑能力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3年11月20日

## 目 录

毛主席的亲切教诲（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专稿）

- .....陈春雨（1）
- 抗战时期安阳城东读书会活动情况.....史存玺（9）
- 陶鸿勋同志和他领导的青年抗日救国会.....陶希超、刘名扬（17）
- 六河沟第一代矿工领袖胡金山.....杨再春（28）
- 流芳千古的英烈郗海泉.....赵仕芳（39）
- 坚贞不屈的抗日志士——孙筱尚.....史存玺（44）
- 战斗在敌人心脏.....冀洪量、刘名扬（61）
- 日本侵略者在渔洋村的血腥屠杀.....高清端、李海生（75）
- 一个日本兵失踪引起的风波.....陶陶、名扬、金星（78）
- 孙有富夺获日军重机枪.....马多明（81）
- 安阳地方团队袭击日寇宣抚班.....王建榛（82）
- 刘月明贺碑刮民财.....霍树旺（83）
- 汉奸区长刘友昭被刺实况.....王子敬口述、来世瑜整理（85）
- 活捉伪区长任浚川.....倪志成、王德勛（86）
- 抗战期间安阳县的地方势力——局子.....杨天吉（88）
- 薄一波来安阳视察停战情况.....西文星口述，张振海整理（107）
- 安阳历史上的空运事件.....张敬之（110）

- 河南省立安阳中学南迁回忆 ..... 崔承武 ( 112 )
- 郭家庙惨案 ..... 陶希超、阎志斌 ( 121 )
- 路马房事件 ..... 陶陶、郝天君 ( 127 )
- 我党对王自全的争取瓦解工作 ..... 张笑平 ( 129 )
- “五卅”运动在安阳 ..... 刘书文 ( 138 )
- 民国十年水治饥民暴动见闻  
 ..... 王德华口述、倪志成、王德劭整理 ( 141 )
- 冀景廉智取救灾粮 马灿林义焚租契券  
 ..... 张庆余口述、张振海整理 ( 143 )
- 慈禧回京过漳河见闻 ..... 王钦之口述,徐志海、郭忠枝整理 ( 145 )
- 两广巡抚马丕瑤 ..... 吕何生 ( 149 )
- 安阳县宗教界开展反帝爱国教育加强上层人士  
 团结教育工作的回顾 ..... 赵德华 ( 156 )
- 五十年代县政协工作回顾 ..... 赵德华 ( 164 )
- 长春观简介 ..... 申兴发 ( 171 )
- 史话“漫水长虹” ..... 张天全 ( 175 )
- 冯玉祥拜师张凤台 ..... 周万民 ( 179 )
- 美籍华人龚希信 ..... 许作民、龚开智 ( 181 )
- 慈禧光绪伐树之争 ..... 周万民整理 ( 77 )
- 袁世凯谋倾岑春煊 ..... 周万民整理 ( 178 )
- 历史与镜子 ..... 刚呈云 ( 163 )
- 安阳地方土语汇集 ..... 马多怀 ( 187 )

# 毛主席的亲切教诲

——回忆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主席

接见新乡地区部分地、市、县负责同志的情景

陈 春 雨

1958年11月1日，正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办钢铁运动形成高潮，不少干部头脑普遍发热，“左”的错误泛滥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乘坐专列到达新乡车站。在郑州会议的前夕，因毛主席觉察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和错误。所以，在列车上召集新乡地区部分同志座谈。这是纠正“左”的错误的序幕，是一次“压缩空气”清醒头脑的会议。

1958年11月1日新乡地委办公室紧急通知说，有中央负责同志来新乡，要县委书记接到通知就立即到地委报到。晚七时半赶到新乡车站以后，才知道是毛主席莅临新乡。可是滕代远部长向大家说，列车很快就要开动，主席没有时间接见大家了。当时地、市、县和新闻单位的同志听了都很焦急，一至要求毛主席接见。在这个紧要时刻，在新乡搞调查的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出了一个好主意，推荐一位新闻记者，以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到列车上向毛主席汇报说车站上有大字报。此计果然很灵，毛主席决定列车停下，召开座谈会，看大字报。

在列车上参加座谈会的有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安阳市委书记刘东升、获嘉县委书记王九书、封邱县委书记韩洪诸，温县县

委书记李树林、济源县委书记侯树堂、修武县委书记张扬琴、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等同志。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登上列车以后，叶子龙同志对每个人的姓名、职务、籍贯进行登记。然后请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按照名单一个一个的问话，并一一握手。然后接过大字报问道：“是谁写的大字报？”耿起昌回答：“是主席视察过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要向主席汇报农业丰收情况。”毛主席笑道：“你们写我的大字报要吴芝圃作证。”接着座谈会开始。

主席首先发问：“你们的钢铁任务是多少吨？有多少人参加？已经搞了多少吨？”

耿起昌答：“全区共上去120万人大办钢铁，内有10万妇女，炼铁任务400万吨，已完成280万吨，其中好铁35万吨，三类铁占50%至70%。”

毛主席接着问：“你们的铁上海要不要，三类铁有否用处？”

耿答：“三类铁要回炉，钢的任务1.8万吨已经完成了。”

毛主席说：“那你们就不需要干事情了，天冷了，那么多人在山上怎么办？下了雪怎么办？该下山了吧！精兵留下，人畜可以下去。”

耿回答说：“准备下去一半，留下一半。”

毛主席听了，不满意地说：“还剩60万人，其中还有4、5万妇女，住到那里？下雨下雪是个事。”

座谈会以后，绝大部分人畜下了山。只留下少数劳力和流铁水的高炉继续坚持炼铁。

毛主席在河北省已了解徐水县全县一个公社的情况，是一个超越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到新乡以后也知道修武县



是全县一个公社。当谈到人民公社时，毛主席问：“谁是修武的？”张扬琴答：“我是修武的”。毛主席接着问：“你们修武社员工资发多少？有没有不发工资的？”张扬琴答：“没有不发工资的。”毛主席发出疑问：“靠不住吧？”众人答：“灾区人民公社有不发工资的。”刘东升说：“我们有60%的社员能发工资。”毛主席说：“还有40%的社员不发工资，那60%的社员发工资，人民币从那里来？”刘答：人民公社卖棉花、卖粮食换来的人民币。”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要不要发点奖励工资？最少要发几角钱工资，比如二、三角到几十元的水平。”问耿起昌：“你们全区社员分配水平怎么样？”耿答：“全区社员平均分配水平每人70元左右。”毛主席又问：“平均每人分配有没有超过100元的？”众答：“少数好的人民公社平均有超过100元的。”

毛主席又问大家：“你们的食堂办的如何？群众生活怎样？每月吃多少粮食，有没有菜，吃多少盐？每人每月十两盐够不够，一天5钱油行吗？你们还可以种些油菜籽，棉籽油也可以吃。每人每天五钱油，一个月就是15两。一定要让群众吃饱、吃好，不仅吃粮，还要吃菜、吃盐、吃油。猪肉一礼拜能吃一次吗？”耿说：“每人每月吃粮50斤，食堂有饭有菜。对五种人有照顾，即：老人、小孩、病号、产妇、客人。”毛主席说：“管食堂的人要注意一下，过去我们不当保姆，现在办食堂，大人小孩都要吃饭，管食堂要比当父母的好一点。大锅饭要比小锅饭好，不好不行。食堂办得好，才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我在想食堂会不会垮台？”众答：“食堂垮不了。”毛主席说：“要让群众吃饱、穿暖，你们有信心。有没有垮的食堂？”众答：“没有垮的食堂，因为在大办钢铁运动中把小锅都砸了！”毛主席说：“你们

这个命革的厉害！把小锅也革了。”毛主席接着问：“你们的幸福院究竟幸福不幸福？有没有不愿意去的？老人在幸福院做活不做活？”史向生同志说：“有人照顾的不去幸福院，没有人照顾的才去幸福院。有的老人闲不住，自动地做点轻活。”

毛主席又改换话题说：“吃饭是一件大事，你们对群众睡觉研究不研究？比如做活紧的时候，要不要就地睡半小时？每天要睡6小时，睡5小时就是没有完成任务。做活松时睡7小时，在工地上让群众睡1小时、半小时。这要当成任务，要‘强迫命令’。吃饭睡觉是件大事，我说这些你们都不赞成。”耿说：“收秋种麦以后再实行。”毛主席不满意地说：“怎么种罢麦实行？！现在就要实行。要研究个‘睡觉宪法’，小孩8小时，青壮年少了不行，睡少了现在受损失，将来受损失，不管怎么紧张，睡6小时，差半小时就是没有完成任务。要‘强迫命令’，这个‘强迫命令’老百姓欢迎，是强迫干部执行。忙时6小时，闲时7小时，这是至少。你们干活有没有连长？连长指挥就在当地睡觉，还要睡午觉。吃饭、睡觉你们都要当成大事研究。这才叫优越性，优越性觉都不能睡行嘛？”

耿起昌在汇报农业生产情况时说，麦子已经种完，棉花已经收70%，棉花平均亩产250斤籽棉有希望。毛主席问：“今年小麦每亩下种量多少？去年小麦下种量多少？每亩平均单产多少？”耿答：“今年小麦下种量每亩平均30斤，有的卫星田每亩下种400斤，个别高产田有下种1000斤的。毛主席听到个别高产田每亩下种1000斤，惊讶而又风趣地说：“每亩下种1000斤挤的要死，还要上楼梯咧！”毛主席继续说：“今年种小麦要深耕一些，麦子种上以后，冬季管理要注意一下，要上追肥，种地要少种多收，深耕细作。用深耕细作之方法，达到少种多收之目的。”

每亩先搞1000斤、2000斤，再搞2500斤。深耕就要分层施肥，你们有这个经验没有？你们专区有多大面积。要慢慢来，不要马上把大田毁掉。要搞大面积卫星田，真正深耕不是7寸，而是1尺以上，深耕细作加上机械化。过去是浅耕细作，广种薄收，现在改为深耕细作，少种多收。史向生同志，省里派你管这方面的工作，请你研究一下。”史向生说：“全省种8000万亩土地，搞1600万亩卫星田，占20%左右。”毛主席说：“这样就是1/5，可能是个出路。深耕细作加机械化”。

座谈会历时一个钟头，会议结束以后，毛主席在列车上又接见了地、市、县负责同志。

为了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半年多的时间内，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两次中央全会，制定了一系列纠正“左”的错误的指示和政策。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的错误”这些事实已是三十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记得当时我们的脑子普遍发热，盲目地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学习了两次郑州会议两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指示、讲话，冷静地进行了反思，从思想上理论上划清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和小集体所有制的界限。认识到急于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调拨，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破坏生产力发展的。那时安阳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两次郑州会议的决议是拥护和认真贯彻执行。群众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管

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概括为“十四句真经”，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利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质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在实际工作中，首先纠正了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并大社的倾向，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把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调小并稳定下来，生产大队调整30%，平均290户左右，生产小队3880个，平均30户左右。其次，根据毛主席算帐的指示，对“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认真进行了清理和退赔。1959年3月份向社员退赔360多万元。4月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根据农民的要求，决定把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帐一般要算”。以后毛主席又反复强调算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主席说：“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百万人民……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静；算帐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根据毛主席这些指示，安阳县从1959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召开了县、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开展群众性的算帐运动，推广了洪河屯公社的四条经验：一决心。下决心纠正“共产风”的错误。二民主。真正让基层干部和社员代表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三兑现。边算帐边退赔；四是第一书记把帐算。对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级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向公社、大队、生产队，以及各级向社员无偿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禽、家畜、农副产品等，认真进行了清算和退赔。这次又向社员退赔了532万元，每户平均63.6元，每人平均14.84元，并

对116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的贪污错误，进行了清理和退赔，退出赃款3.6万多元。从而遏止了“共产风”的泛滥，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广大社员高兴地说：“五八年，太混乱，一天只吃三顿饭，工分不值一毛钱，请假装病不想干，算帐多劳又多得，今后一定加油干。”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和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意义。”使我感触最深的是毛主席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讲话，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的国家是个商品生产还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又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发展。商品生产看它同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的为社会主义服务。”毛主席上述

谆谆教诲，虽然是34年以前的，现在重温起来，对于当前深刻领会党的基本路线，清除“左”的旧思想禁锢，加速改革开放的步伐促使经济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1958年4月至1960年8月任中共安阳县委书记）

# 抗战时期安阳城东读书会活动情况

史存仁

## 一、读书活动的发起

安阳城东前崇义村有名知识青年名叫常存仁（后改名孙日新），战前在城内大公中学读书。日军侵占安阳时，他随学校一起南迁舞阳。不久，他和同学常百川（安阳县沿村台人）一起离开学校，去陕北投奔八路军，寻求抗日救国道路。他们参加了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安吴堡抗日青年训练班，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结业后，常百川被分配到八路军某部工作，常存仁被派回敌后做统战工作。

常存仁经过西安、郑州，于1938年7月回到安阳县西部山区岭头村，想在国民党安阳县政府里边活动，推动国民党抗日。但事态艰难，困难很大，于是就在当年10月回到前崇义村，开始在青年朋友中间进行工作。

常存仁从陕北回来时带来了一部分抗日书刊，他把这些书刊借给自己的同学、亲戚、朋友阅读，并和他们一块谈读书心得，讨论时局。这些青年都不甘心当亡国奴，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思想上十分苦闷。阅读了抗日书刊后，豁然开朗起来，觉得中国不会灭亡，于是从迷惘中振作起来，积极寻求救国之道。用这种办法，仅两三个月时间，常存仁就在崇义、瓦亭、大佛、北务等村联系团结了二十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并从中发展了三名“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

1938年冬天，东瓦亭村青年学生王魁升（即王汉华）从黄河南逃难回来，一面在家养病，一面在私塾里读古文。常存仁同王魁升在大公中学念书时是很要好的朋友，听说之后就去看他。老朋友劫后重逢分外亲切，自然谈到了各自的经历。常存仁就把他突破层层封锁到陕北投奔八路军，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的过程向王魁升作了介绍。王魁升向常存仁询问抗日前途问题。常存仁知道这是当时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就讲了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道理，讲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王魁升听了这些前所未闻的道理茅塞顿开。王魁升的表弟任士方也很受启发。从此，常存仁就经常送书给他们看，并同他们一起议论读书收获。王魁升、任士方对私塾先生胡老秀才讲的古文不再感兴趣，每天钻在楼上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这个私塾就在王魁升家里，有学生数十人，其中年龄大一些的还有西瓦亭村张栋（张秉衡）、张朴，崇固村张耀华、张晴林，东冠带巷任士元等。王魁升、任士方就将书籍传给这些大同学看，这些同志也极感兴趣，热心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常存仁送来的书多数属于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普及读本和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如《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青年修养》等。青年们读书的过程也是思想感情发生变化的过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使他们之中多数人选择了革命道路。后来王魁升在1956年7月所写的《自传》中提到“当时看了这些书以后，就感到找到真理了，初步奠定了我的革命人生观”。任士方也说，从开始读进步书籍到搞革命活动，是必然的发展。正是这些进步书籍引导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离崇义村约十里路的张梁固村有位抗日青年，名叫张芳勋，



参加过华北抗日民军朱程的部队。他在本村和白壁等村联络了杨天富、魏少廉、张蔚林等一批青年，经常一起讨论抗日救国问题。常存仁与张芳勋建立了联系，供给他们学习资料，帮助他们学习。

1939年春节之后，常存仁又在自家办起了一所义务小学，不收学费，由自己担任教师，教农民子弟读书识字，还对年龄较大的学生讲爱国道理。晚上，在教室里办农民夜校，吸收农民青年参加学习，秘密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后来参加了革命的孙德信、孙继尧等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 二、读书会的成立

到了1939年四、五月份，常存仁联系的知识青年和农民青年已有四、五十人，分布在崇义、瓦亭、梁固三个村周围。他同王魁升商量，为了便于活动，应该建立个组织。组织取什么名称，开始考虑沿用“民先”。后来想到“民先”是战前党的外围组织，抗战开始后已逐步为青年救国会所取代，在敌占区再使用这种名称不够稳妥。常存仁一度想用“正义社”的名称，认为青年人搞革命往往是由正义感开始的，用这个名字可广泛团结有抗日救国正义主张的各方面青年。因此，他同王魁升曾与中崇义村清末进士、民初省长张凤台的孙子张友良、张友绍等人协商，想共同建立一个统一战线式的组织，名字就叫正义社。原来张氏弟兄也团结了一部分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搞过些抗日活动。他们办的油印《胜利》小报，传播抗战消息，并对岭头县政府坐吃山空不搞抗战表示过不满。常存仁、王魁升曾给小报投稿，也帮助散发过报纸。但张友良等人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据说国民党派遣人员朱建邦（谢梅村）就住在他家，并装有电台，《胜利》小报上的一些战场消息就是用电台抄收到的。随着国民党对抗战态度的